

梁启超

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戊戌变法败后，梁氏流亡海外数年。这期间，他研
研于明治维新后之“东学”，并探研，孜孜于其中近代
西方思想文化学说，并广泛介绍，广布国内，希
冀启蒙，以造“新民”。由西而东，西学东渐，却假东
学魂灵，故梁氏笔端之东学，别具一种异样色彩。然
其含有者何，又异乎寻常。本著即以此为要，尤以东土
文献为据，既条理贯穿，指陈厘定，也提要辨析，就史
论说，从而自成篇目，以期将梁氏研究再推一步。

郑匡民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梁启超

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郑匡民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 郑匡民著. — 2 版.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ISBN 978 - 7 - 5458 - 0075 - 3

I. 梁… II. 郑… III. 梁启超(1873~1929)—思想评
论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0405 号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郑匡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 × 935 1/16 印张 19 字数 273,600

2009 年 7 月第二版 2009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001—4,500

ISBN 978 - 7 - 5458 - 0075 - 3/K · 9

定价 32.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 1950 年 5 月建所,已阅 53 年。建所初期曾出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本所同仁的研究论文,未几停刊。1954 年,中国科学院创刊历史学界的重要刊物《历史研究》,以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和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分任主编、副主编,研究所学者有了发表论文的固定园地。1960 年,《历史研究》主编改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担任,编辑部也迁到近代史研究所,直至“文革”被迫停刊。1976 年,《历史研究》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仍由黎澍主编,但编辑部独立,迁出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鉴于新的历史时期到来,历史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中国近代史研究前景可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了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刊物《近代史研究》杂志。这个刊物创办迄今也快满 25 年了,它在推进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和物质环境。本所学者撰著的学术论文空前增多,专门著作的发表也空前增多。尤其是 1989 年以来,所里在适当关注集体著作的前提下,提倡研究者发挥个人长处,加强专题研究。经过 10 年努力,我们在专题研究上取得了可观成绩。10 年来本所研究人员出版的各类专著超过了 170 部,大大超过了此前数十年发表专著的总和。这些专题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拓宽并且加深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科建设。这些专著,都是分别在各种不同的出

版社出版的。我们一直在设想,如何选择若干比较优秀的专著,集中在一个出版社出版,期能全面反映本所学者的研究趣向,向学术界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本所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单位,无法全面支持学术专著的出版,所以我们的条件比较苛刻,希望在不提供出版经费支持下实现集中出版学术专著。几经探索和征求,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做这样的赔本生意,事情便耽搁下来。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获悉我们的想法,愿意承担出版任务,这使我们喜出望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上海书店出版社随即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出版的缘起。

2002年,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讨论,选择了三本专著,决定纳入首批专刊目录,在2003年问世。这三本专著是: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这三本正好是三位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的研究报告。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目的很单纯,就是向学术界推出本所学者的专门著作,交流问学,请求学术的批评,以期推动学术进步,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每一本著作都可以列入专刊,大体需经本所学术委员会讨论,方可入选。我们希望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细水长流,每年出版二三本,垒珠积寸、集腋成裘,以成大观。是为序。

张海鹏

2003年3月20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序

耿云志

郑匡民君留学日本八九年，于 1996 年夏天归国，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他博士后研究的成果。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于政治与学术文化两方面都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对于他的研究一直很受学界的注意。近年来国内外发表的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论著尤显增多。但国内学者对梁氏思想与日本思想界的渊源关系尚未曾做过深入探讨。梁启超流亡日本 14 年之久，即使将其访澳、访美及其他几次短期离日的时间除去不计，亦有 13 年多的时间。而这期间，梁氏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对国内思想舆论发生极大的影响。对于这期间，他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想家的影响，显然是一个必须提出和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但这项研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它要求两个必备的条件：（一）须对梁启超及其所依托的中国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二）须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这两方面的了解都不是仅仅读一些书，查一些资料即可做到的，需要作者有相当的时间寝馈其中，反复体悟方可。我觉得，匡民君是比较具备这些条件的很难得的人选。

此书题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按“东学”一词，如今已很少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不十分精准。但斟酌再三，想不出一个更简明的提法来替代。在清末，学界曾较普遍地使用“东学”一词来指称日本的思想学术。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学”

一词。因此,将当年梁氏本人指谓日本思想学术的词语,在研究当年梁氏思想的著作中加以采用,应当是可以为学界所接受的。因为这个研究课题和书名是我与匡民君共同商定的,我负有一部分责任,故须略作交代。

此书在1998年即已写成初稿,通过专家组的评议。从那时以来,匡民君对书稿反复推敲,磨砺,对所涉诸多问题更加深入探究。故四年以来,颇多增删,书稿遂更加成熟。这种不急不躁、追求更高水准的治学态度,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中实属难得。

梁启超是个知识欲极强而又学习能力极强的人,况其精力充沛异乎常人。他每天从日本学者的论著中了解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学说。那时候,日本先已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吸收西学的时代。身处那个氛围中,以塑造“新民”自任的梁启超,怎样急切地要把他了解到的新知识和新思想、新观念灌输给国人,这一点,我们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就可以看出。但这样做的结果,不免缺少分析、过滤和从容消化的工夫。就是说,梁氏宣传的西学中,渗入了不少日本思想家的思想成分。匡民君的这本书,主要用力处,就是尽量厘清和析释出这些成分,以求对梁启超的思想著述有更深入和更精确的了解。这个工夫是相当繁难的。匡民君尽量搜集到当时影响到梁启超的日本思想家的著作和他们所刊行的杂志,认真解读它们,然后再与梁氏发表的大量相关论著加以比较,从中发现构成梁氏思想的材料来源,及其在理解与表达方式上,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想家的影响。这种工作真有点像在化学实验室中做化验分析一样。社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此其一证。只不过其精确程度会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

不言而喻,做这样的探究,必须熟读材料,反复推寻,精密运思。这就是何以初稿成后,又用了四年的时间做修改的工作,我们不能不敬佩作者这种认真求实的态度。八百多年前,朱老夫子以“宁拙勿巧”、“宁繁勿略”之语训示学子,如今能坚持如此做学问的实在很难得了。

当然,任何一个课题研究都是不可穷尽的。关于梁启超的研究,关于梁启超思想渊源的研究,更具体地说,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之间的研究,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的课题。但匡民

君此书,确是有关此一课题的最新的、最扎实和最可信的研究成果。今后凡做此项研究的学者,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不能不参考、借鉴这本书。这就是此书的成功和它的价值所在。

2002年10月17日

序

野村浩一

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同为戊戌变法运动过程中的政治中心人物，他又以其后来丰富多彩的言论活动，成为辽阔中国近代思想上的一流思想家，这一点当然广为人知。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梁启超一直是带领当时思想界的一位杰出思想家。他在从事具体政治活动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界率先引了新的思想，并在传统学术的批判性检讨及其他领域中也展开了异常活跃的活动。

然而，在梁启超的这种政治性、思想性生涯中，当即引人注目的史实是，在变法运动失败以后直到辛亥革命的大致十余年间，他几乎是在亡命之地日本渡过的。梁启超主要以横滨和东京为据点从事政治活动，展开各种言论。这样，在考察梁启超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和领域，这就是梁启超与日本，梁启超的东学特别是在其背景中所潜伏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或者中日比较思想史的这一视点，梁启超生活在明治后半期的日本，他经历了当时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广泛地接触了在此起作用思想和思潮，并由此编织出了他自己特有的思想。这就成为梁启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近代中日文化和学术关系的研究领域。

此书的作者郑匡民氏，在中国的大学毕业之后，又多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他更用力钻研，现在终有梁启超研究成果的问世。我相信，题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一书，在梁启超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学界实为一大贡献。在此如果允许我就本书谈一下作为我个人的感想，我想举出以下两点。

第一、作者坚持“忠实于资料”这一学术正轨,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这一点,只要看看书中所显示出的庞大注释,谁都会相信无疑。在此,作者围绕梁启超启蒙思想这一主题,出示了有关当时日本诸思潮——即“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日本民权思想”、“日本国家思想”等一系列原始资料,同时对他们这些思想家的经历、活动以及环绕他们的政治和思想状况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检验和说明。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吸收了日本许多相关研究成果,当然经过了作者的选择取舍。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说,作者深入地接近了梁启超的“东学背景”——即梁启超所接触到的当时的日本思想实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上展现了梁启超与明治日本的接触情况。这种研究,与那种随意性的“断章取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的忠实贯彻,无论在什么时代,学术研究才能常常显示出它的本来意义。

第二、作者通过这种探索,极其明畅地解读了梁启超从明治日本诸思想以及由它们所介绍和导入的欧洲思想中接受了什么而又拒绝了什么。这不仅在梁启超研究中,而且在整个中日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中都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思想接触无论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进行,原本就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都处在近代欧洲侵入前所未有过的激流之中。日本寻求前进的道路曲折起伏。梁启超正是为了寻求自身国家和民族摆脱危机的道路而展开其活动和思索的。他接触了当时日本의思想和言论,并由此来吸收欧洲的思想。在此所呈现出的接受、反驳和搏斗的轨迹,可谓是一幕思想的戏剧、精神的戏剧。这里也隐含了我们思考中日关系的本质性问题。在这种脉络中,探明梁启超的“东学背景”,即使对于想重新回顾近代日本足迹的日本人来说,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素材。

相应于梁启超这种多面性的思想家来说,此书的主题本身以及研究课题当然也是广泛的。从这种视点来看,有关此书主题还有不少尚待挖掘的地方,此外,在考察诸思想的方式上亦非完全繁简得当。另一方面,如何在梁启超研究中确定该课题的位置,并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整体来进行俯瞰考察等,也留下一些问题。这大概就是最初出版著

作的作者今后应加以研究的课题吧！

我认为此书有利于推进本领域的研究，故应作者之请，写了上边的文字作为序言。

2000年5月于东京

(王中江 译)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与流亡日本后的处境	4
第一节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	4
第二节 流亡日本谋救皇上	19
第二章 福泽谕吉启蒙思想与梁启超	44
第一节 福泽谕吉的身世和师承对其思想的影响	44
第二节 福泽谕吉与西洋文明的初次接触	51
第三节 福泽谕吉的“以西洋文明为目的”与梁启超的 《文野三界之别》	55
第四节 文明之形质与文明之精神	66
第五节 福泽谕吉的“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对梁启超 的影响	73
第三章 中村正直《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与梁启超的新民 思想	83
第一节 中村正直的生平与启蒙思想	83
第二节 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与《自由之理》	102
第三节 中村正直对梁启超的影响	111

第四章 日本民权思想与梁启超	122
第一节 日本的民权思想与东洋的卢梭.....	122
第二节 中江兆民的义理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	135
第三节 中江兆民积极自由观对梁启超的影响.....	149
第五章 日本国家主义思潮与梁启超	170
第一节 甲午战后日本国家主义的发轫.....	170
第二节 高田早苗译《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与浮田和 民伦理帝国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181
第三节 加藤弘之《强者の权利の竞争》对梁启超的影响.....	200
第六章 国家有机体论与梁启超	228
第一节 梁启超与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译的《国家论》.....	228
第二节 伯伦知理和他的《国家论》以及对日本的影响.....	234
第三节 伯伦知理学说对梁启超的影响.....	252
第七章 结 论	269
参考文献	284

引 言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随着列强对中国侵入的深入,中国闭锁的大门被逐渐打开,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找到一种适于生存的资源,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一条向西方学习之路。自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的“采西学议”以来,中国“师法西方”的范围越来越大,始而技艺、器物,继则政法、思想,最后发展到对整个文化的改造。至 19 世纪末,甲午战争的失败更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骤强,是在于其成功地学习了西方,变法图强所致,而且他们又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同文同种,情势风俗相近,易于仿行。所以,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再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在当时被认为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在他们的提倡下,使得中国在“师法西方”的道路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走上了一条以日本为中介的“师法西方”的道路。而梁启超正是这条道路的倡导者和实行者。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袖,是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中国近代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从毛泽东、陈独秀、鲁迅到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都受到过他极深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几乎影响了清末民初以后的中国。由于梁启超所处的重要位置,所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一直成为中外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曾倡导通过日本的译著来学习西方,但是,他真正地走上治“东学”的道路,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日本后才实现

的。当时,他与同门罗普在日本箱根读书,经过几个月的研索,创制出一种读日文书的方法,叫“和文汉读法”。用这种方法,梁启超声称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读懂日文。当然,梁启超所谓的读懂日文自有他自己的含意,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知道某个单词的读音,而仅是理解日籍的内容。由于当时梁启超所读的日本书籍绝大部分都是用汉文体的日文写的,以梁启超的才能和汉学素养,于短期内大体读懂这些日籍应不成问题。当时,梁启超正是利用其“和文汉读法”来广泛阅读日本书及日译西籍,才走上了治东学的道路。而正是“东学”使他通过东籍,假途日本以了解西方,缩短了和西方的距离,拓宽了视野,“脑质为之改易”。在他流亡的十数年间,为了摄取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他几乎涉足了当时日本各个流派的领域,阅读了大量日籍,其中的思想,已深入了他的思想的“知层”,经其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刊物向国内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梁启超是在日本的土地上通过日本人的译著或著作来了解西方的,所以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是一种被“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受到了“日本化”的西方思想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家已开始注意到上述问题,在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新思想和新观念乃是受到日本影响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对梁启超具体受到日本何种流派的何等影响方面还缺乏研究。而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对思想家进行追本溯源地研究,海外学者已作出了可观的成果,仅就笔者有限所知,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先生所领导的五十人小组自1993年即进行着《梁启超——关于他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过程》课题的研究。法国的巴斯蒂先生也在进行类似方面的研究,其论文《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就是一篇力图探索日本人吾妻兵治所著《国家论》对梁启超及中国近代所产生影响的论文。此外,还有大量的海外研究者也都在着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对深入认识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加深两种文化的沟通理解,以

便取长补短也极具参考价值。

笔者在十余年前曾留学日本,在 10 年的留学生涯中曾涉猎过一些日本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一直想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在博士课程期间,曾得到高田昭二、滨久雄、沟口雄三、近藤邦康诸师的指导,对梁启超在日本的情况作过一些初步的探索。但由于梁启超当时所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他所读过的日籍,篇帙浩瀚,加上年代既久,搜集不易,因此当时对梁启超受日本影响方面,仅开了一个头绪,未能作深入研究。两年前归国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活动站,在耿云志师的指导下,又重新进行此课题研究。为搜集资料,又重返日本,受到古岛和雄、狭间直树、宫村治雄等先生的悉心指点,临行先生们又将所写著作与论文馈赠于我,使我能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归国后,我即独处一室,闭门著述,时正值炎夏,挥汗如雨,对照日文原著,兼取材于各书中,极为艰辛。由于课题限以时日,而梁启超所涉及日文原著又浩如烟海,以浅学如鄙人者,自思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但又思鄙人乃一介书生,对养育自己的祖国,无以报效,惟有不断砥砺,不断钻研而已。故虽自知驽钝,不敢自弃。当时又值家中多事,故历尽艰难,至 1998 年 10 月,方告杀青。此书虽不甚成熟,想学界诸前辈必恕鄙人之力所不逮,许鄙人之心所欲赴,若使此书能得为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上的一块垫脚石,则鄙人一定会感到无限荣幸。

第一章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 与流亡日本后的处境

第一节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

甲午一战，一向以万邦宗主、天朝上国而自居的清帝国，竟败给了“蕞尔三岛”的小国日本，此事件使中国朝野上下均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面前，中国的知识界，不得不把自己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东洋。随着对日本关注的深入，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存的思想忽焉勃兴，一种借途日本，学习西洋的途径，被普遍提倡。这种主张不仅表现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思想中，就连清廷的一些高级官僚如张之洞等也持相同观点。他们之所以持这种主张，主要是认为日本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成功地学习了西方，中国如欲学习西方，不如直接效法日本，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易于模仿。效法日本，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些人的提倡下，使中国在对外国文化思想受容的取向上，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一种以日本为中介来摄取西洋文化的所谓“东学”应运而生。

梁启超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壤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在这种新思想输入运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饮冰室合集》（以下及各章均简称《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